



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扬州大学古代史重点学科建设基金资助项目

建安学术史大纲

◎徐俊祥 著

建安时期(196—220)是中国中古史的重要阶段。以汉献帝年号为断限,该时期东汉已名存实亡,三国鼎立局面逐渐形成。在国家从统一走向分裂的过程中,政治秩序的变化与统治方法的改变,对人们的学术取向产生深刻影响。从学术史发展来看,该时期是汉代学术向魏晋学术转型的过渡期,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不同系统的知识重新进行整合。两汉时期形成的经学传统并未中断。建安时期伴随着统一王朝的解体,出现了文化多元的局面,如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在这一时期都有一定的表现。六朝时期出现的种种思潮在建安都能找到其端绪。

广陵书社

建安学术史大纲

◎徐俊祥 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安学术史大纲 / 徐俊祥著. —扬州: 广陵书社, 2009.12
ISBN 978-7-80694-536-0

I. 建… II. 徐…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
中国—建安(196~220) IV. B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0472 号

书 名	建安学术史大纲		
著 者	徐俊祥		
责任编辑	徐大军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889 × 1094 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536-0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汉末、三国间的学术大势	20
第一节 “道术将为天下裂” ——季汉儒学独尊地位的动摇	20
第二节 经学衰落时期的学术格局	52
第三节 学术环境的变迁与学术的转型	86
第二章 建安学术与思想发展的线索	104
第一节 东汉至三国经学传承之谱系与学者流布	104
第二节 汉末建安史学的发展	137
第三节 建安时期诸子学的复兴	147
第三章 东汉经学最后的辉煌	160
第一节 郑玄：整合今、古文经学	160
第二节 何休：《春秋》公羊学功臣	178
第三节 蔡邕：学识渊博的士林领袖	202
第四节 应劭：匡谬正俗	221
第四章 经世的强化与学术思潮的新变	241
第一节 仲长统：乱世杂家	241
第二节 荀悦：以儒为经，道、法为纬	254

第三节	刘熙:经学与博物学的贯通	268
第四节	孔融:心存汉室的儒学名士	275
第五章	学术思想的多元化与学者的分化	285
第一节	刘劭:崇尚务实的人才识鉴家	285
第二节	虞翻:会通儒、道的易学家	302
第三节	王粲:出入儒道	315
第四节	徐幹:注重应用的儒学研究	323
第六章	独树一帜的曹氏父子	337
第一节	曹操:离经叛道的治世之术	337
第二节	曹丕:守成与创新	348
第三节	曹植:布衣论政	355
第七章	对建安学术的总结	364
第一节	建安学术史上解决的主要问题	366
第二节	建安学术的特色及影响	381
附:	参考论著	393
后 记		399

引 言

一、“学术”、“学术史”及学术史研究的重心

本书以建安时期的学术为研究对象,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是学术?笔者认为,由于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仍见诸仁智,为使本文有相对明晰的讨论范围,对这一概念必须作简单辨正。

“学术”一词,大约出现于汉代。在没有成为固定词组之前,“学”指学习,“术”指方法。“学术”实际上是“学习某种方法或技术”的意思。如司马迁记述申不害“学术以干韩昭侯”¹,张仪曾跟随鬼谷先生“学术”²。此二例中,申不害学的是“统治术”,张仪与苏秦学的是“纵横家术”,其“学术”一词的语义皆与今有异,但汉代已出现将“学术”一词固定化并加之特定涵义的用法。偶有一例始见于东汉后期。东汉后期,西北边地羌人不断起义,汉政府先派盖勋去镇压,后以宋棗代之。宋棗对盖勋说:“凉州寡于学术,故致反叛,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盖勋反驳说:“昔太公封齐,崔杼杀君;伯禽侯鲁,庆父篡位,此二国岂乏学者?”³这里宋棗语中的“寡于学术”似指儒家经学传统的缺乏,他认为由此导致了道德教育功能的减弱。此处的“学术”一词,显然

1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2146页,中华书局,1982年。下版本同。

2 《史记·张仪列传》,第2279页。

3 《后汉书·盖勋传》,第1880页,中华书局,1982年。下版本同。

已成为固定名词,为学者之“术”,即通常所指的文化修养。此后,“学术”一词在历史上被频繁使用,被赋予了多方面的涵义。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一词所表示的意义已渐丰富,但大率不出这几方面:一、泛指人文学科方面的才能¹;二、指各项学术专长²;三、特

-
- 1 《晋书·武陵王晞传》:“晞无学术而有武干,为桓温所忌。”第1727页,中华书局,1977年。《南齐书·王奂传》:“奂无学术,以事干见处。”第848页,中华书局,1972年。《梁书·鄱阳王恢列传》:“(恢子)范虽无学术,而以筹略自命,爱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题章,亦时有奇致。”第352页,中华书局,1973年。下版本同。
 - 2 《魏书·真定侯陆列传》:“陆曾孙轨,字法寄,稍迁洛阳令。时天下多事,轨惟以深刻遇下,死多酷滥,识者非之。孝静时,邺宫创制,以轨为营构使,除徐州刺史。轨望风既陋,又无学术,虽历名位,时人轻之。”第346页,中华书局,1974年。《北齐书·许惇列传》:“惇少纯直……虽久处朝行,历官清显,与邢邵、魏收、阳休之、崔劼、徐之才之徒比肩同列。诸人或谈说经史,或吟咏诗赋,更相嘲戏,欣笑满堂。惇不解剧谈,又无学术,或竟坐杜口,或隐几而睡,深为胜流所轻。”第575页,中华书局,1972年。《南史·何尚之传》:“(何尚之之子敬容)拙于草隶,浅于学术,通包苴饷馈,无贿则略不交语。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贪吝为时所嗤鄙。”第796页,中华书局,1975年。下版本同。

指儒家经学等人文学科研究¹；四、指“智识”、“谋略”²。魏晋南北朝以前，“学术”一词使用范围极广，使用的随意性较大。

自隋唐开始，“学术”一词渐特指专门而系统的学问。如唐代，国家为弘扬“学术”，特设“集贤学士”专职管理“学术”³。此时的“学术”一词用于指专门化和系统的学问，词义的内涵反而缩小了，普通的求知问学者不被看成是有“学术”。宋代“学术”一词

- 1 《魏书·儒林列传·孙惠蔚传》载孙惠蔚上疏之语：“然则六经、百氏，图书秘籍，乃承天之正术，治人之贞范。……及秦弃学术，《礼经》灭绝。汉兴求访，典文载举，先王遗训，灿然复存。暨光武拨乱，日不暇给，而入洛之书二千余两。魏晋之世，尤重典坟，收亡集逸，九流咸备。观其鸿阅史篇，访购经论，纸竹所载，略尽无遗。”第1853页，中华书局，1974年。《南齐书》卷三十九《列传第二十》：“史臣曰：儒风在世，立人之正道；圣哲微言，百代之通训。洙泗既往，义乖七十；稷下横论，屈服千人。自后专门之学兴，命氏之儒起，石渠朋党之事，《白虎》同异之说，《六经》五典，各信师言，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独擅；东都学术，郑贾先行。康成生炎汉之际，训义优洽，一世孔门，褒成并轨，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而王肃依经辩理，与硕相非，爰兴《圣证》，据用《家语》，外戚之尊，多行晋代。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间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第686页，中华书局，1972年。《魏书·外戚上》中《冯熙传》载：“诞字思政，修字宝业，皆姿质妍丽。年才十余岁，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诫，然不能习读经史，故兄弟并无学术，徒整饰容仪，宽雅恭谨而已。”第1820页，中华书局，1974年。
- 2 《梁书·处士列传》：“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世之诬处士者，多云纯盗虚名，而无适用，盖有负其实者。若诸葛璩之学术，阮孝绪之簿阅，其取进也岂难哉？终于隐居，固亦性而已矣。’”第753页，中华书局，1973年。《北齐书·徐之才列传》：“长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无学术，每叹云：‘终恐同《广陵散》矣。’”第448页，中华书局，1972年。
- 3 《旧唐书·职官志·中书省》：“集贤学士之职，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第1852页，中华书局，1975年。

的语义仍指特定的流派和思潮,并且所涵盖的知识面更广,“学术”用于指专门化的学问,意思更为明显。在宋代,史学、算术、天文历法、思想派别等都明确成为“学术”一词涵盖的内容¹。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道教颇为发达,道教系统之职位亦要通过考试而获得,道教经典成为考试的内容,很自然,研习道教经典也被纳入了“学术”的范畴²。金元时期,“学术”一词的外延扩大到几乎今天所说的所有人文科学涵盖的领域,“一事之宜适,一物之节文”都是“通

- 1 《宋史·薛昂列传》:“昂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常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拜翰林学士,以不称职改刑部尚书,转兵部。”第11122页,中华书局。下版本同。《宋史·儒林列传·刘羲叟》:“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欧阳修使河东,荐其学术。试大理评事,权赵州军事判官。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及修唐史,令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寻为编修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以母丧去,诏令家居编修。书成,擢崇文院检讨,未入谢,疽发背卒。”第12838页。《宋史·文苑列传·蔡肇》:“徽宗初,入为户部、吏部员外郎,兼编修国史,言者论其学术反复,出提举两浙刑狱。”第13120页。《宋史·徽宗本纪》:“(崇宁元年)丁丑,诏:‘诸邪说诚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祐学术政事,并勿施用。’”(崇宁二年)冬十一月庚辰,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察举,必罚无赦。”(大观元年)癸卯,诏:‘自今凡总一路及监司之任,勿以元祐学术及异意人充选。’”(宣和五年)秋七月戊午,以梁师成为少保。己未,童贯致仕。起复谭稹为河北、山东、燕山府路宣抚使。庚午,太傅、楚国公黼等上尊号曰‘继天兴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不允。禁元祐学术。”第366、368、378、412页。
- 2 《宋史·选举志·补道职》:“补道职,旧无试,元丰三年始差官考试,以《道德经》、《灵宝度人经》、《南华真经》等命题,仍试斋醮、科仪、祝读。政和间,即州、县学别置斋授道徒。蔡攸上《诸州选试道职法》,其业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提学司访求精通道经者,不问已命、未仕,皆审验以闻。其业儒而能慕从道教者听。每路于见任官内,选有学术者二人为干官,分诣诸州检察教习。《内经》、《道德经》置博士,《圣济经》兼讲。道徒升贡,悉如文士。初入官,补志士道职,赐褐服,艺能高出其徒者,得推恩。道徒术业精退,州守贰有考课殿最罪法。陈州学生慕从道教,逾月而道徒换籍,殆与儒生相半。有宋瑀者,愿改道徒内舍,献《神霄玉清万寿宫雅》一篇,特换志士,俟殿试。由是长倖以下受赏有差,其诱劝之重如此。宣和二年,学罢。”第3690页。

学术”之宰相必须研究的对象¹。但其时学术已有所谓“学术正大”与“学术不纯”之分²。明代承元之后,中国专制制度发展更为完善,思想控制更为严密,“学术”一词的语义无大的变化。此时,墨守成规的经学成为主要的学术,而一些改革的言论则被视若“学术不正”³。清代,“学术”一词分出二途:一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包容的范围日趋广泛,所及达于自然科学;二是学界传统将自然科学仍排除在外。前者表现在清代对教育进行整顿方面,扩大了学校教育涵盖的知识范围,后者则表现为学者仍坚守所谓“国学”传统。

《清史稿》卷一百七《选举志·学校》详细记载了清代兴办学校的过程。在清代兴办学堂的过程中,办学大臣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理解为学堂中可学的“学术”,认为科举所从事之“学术”远不如学堂所学全面,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遂诏自丙午科始,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寻谕各省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于是沿袭千余年之科举制度,根本蠲除,嗣后学校渐广,学术思想因之变迁,此其大关键也。”从《清史稿》对一些“学术”贡献的评述中亦可见清代理解的“学术”实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评康有为,说康氏“古今学术无所不通”。在罗列其《孔子改制考》

-
- 1 《金史·礼志》:“(金世宗)统以宰相通学术者,于一事之宜适、一物之节文,既上闻而始汇次,至明昌初书成,凡四百余卷,名曰《金纂修杂录》。”第692页,中华书局,1975年。
 - 2 《元史·铁木儿塔识列传》:“铁木儿塔识天性忠亮,学术正大,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又:“时修辽、金、宋三史,铁木儿塔识为总裁官,多所协赞云。”第3374页,中华书局,1976年。《元史·姚枢列传》:“初,帝尝论天下人材,及王文统,枢曰:‘此人学术不纯,以游说干诸侯……’”第3714页。
 - 3 《明史·职官志·都察院》:“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第1768页,中华书局,1974年。

等一系列文科学术著作后,居然将《电通》也放入其学术著作中¹。又载无锡人徐寿为“昌明泰西学术”,“磨水晶印章成三角形”以作三棱镜之用,且研究弹道轨迹²。可见至清代,“学术”一词包容极广,已包括人类全部的知识经验和思想。

。但由清至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学的冲击,“学术”一词的内涵虽包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学术界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倾向仍十分明显。硕学之士对“学术”的界定也仍限于人文科学的范畴。

如梁启超释“学术”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³据此观点,他写成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书中既论述了中国学术传统的传承,又据此分析了古人以学术研究基础而发明的“真理”,并且明言此书体例与哲学史全然不同:“鄙论标题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非欲为中国哲学史也。”⁴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的确不同凡响,其立意首重贯穿于学术研究中的研究动机、目的等“思想”层面的内容,《大势》明言“学术思想”,其后的《清代学术概论》首篇则为“论时代思潮”。但梁启超所论重思想的层面,其学术论著近乎思想史,在体例上易使人误解,故梁启超对“学术”一词的内涵限定得很小。

- 1 《清史稿·康有为列传》:“有为天资魄异,古今学术无所不通,坚于自信,每有创论,常开风气之先。初言改制,次论大同,谓太平世必可坐致,终悟天人一体之理。述作甚多,其著有《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大同书》、《物质救国论》、《电通》及《康子》内外篇、《长兴学舍》、《万木草堂》、《天游庐讲学记》,各国游记,暨诗文集。”第12833页,中华书局,1977年。下版本同。
- 2 《清史稿·艺术列传·徐寿》,第13929页。
- 3 梁启超:《学与术》,《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第二十五下,第12页,中华书局,1996年。
- 4 梁启超:《〈周末学术余议〉附识》,《新民丛报》6号。转引自《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夏晓虹导读。

章太炎对“学术”内涵的理解较之梁启超略有扩大,他明确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即所谓“国学”。故他不但屡屡发起国学运动,号召国人面对西学的挑战重视本民族的传统学问,还身体力行,对国学展开潜心研究。后人曹聚仁据章太炎在上海公开讲学整理成了《国学概论》一书,据之可知章太炎对学术内容的取舍。该演讲除概论外,具体内容实际上只有三章,分为经学的派别、哲学的派别和文学的派别,似乎其间没有史学。但在其他场合,章太炎多次强调,史学亦应是“国学”的一部分。汤志钧《导读》:“《民报》另有《国学讲习社广告》:‘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可知“章氏把诸子、文史、制度、内典、理学、历史等列入‘国学’,实际上是把过去‘经、史、子、集’都算‘国学’,也就是说,把传统的固有学术、文化几乎都笼入‘国学’范围”¹。如此,按章太炎的理解,则大体上讲,“学术”应指中国古代的人文科学,指对古代人文科学各方面的研究。

梁启超和章太炎正是出于修正清人受西学影响而对学术的误解才对“学术”一词提出上述看法的,所不同的是,章太炎之言论包容更广,在近代中西文化论战中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

由上可知,由清至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学术”一词已发展成熟。

历史上既有“学术”,也就有了对前代“学术”的研究,于是也就有了所谓“学术史”。学术史研究的内容,当然基于对“学术”的理解。

从前人的研究情况来看,学术史研究首先是指对古代“学说”自身的产生及流变的研究;其二,研究后人对前人的研究与评说;

1 曹聚仁整理,章太炎著:《国学概论》,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第三,研究为研究而开展的史料搜集和目录编撰活动¹。学术界在这三方面几无异议。学界争论的焦点是学术史研究是否应包括自然科学在内。

近年来颇具代表性的革故鼎新之作是新近出版的由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其整体结构包括经学、小学、史学、文献学、诸子学、科学、文学、目录学和宗教虽因其他原因被排除在本书之外,但作者并不否认它们的“学术”性质。似乎书稿的体例已明确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学术”,从《学术史》李学勤所作的序的表述中我们亦可知,其明确认为“学术”应该包括今天所说的文科和理科:

在这里需要说一说什么是学术。80年代有过什么是文化的热烈讨论,那时我曾戏仿禅语说:文化这个词,不讲人人明白,越讲越不明白。学术这个词,或许也是这样。不过在近些年,国内有一种趋势,说学术似乎不一定包括自然科学,学术与科学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这在字面上、内涵上都是不合适的,用在现代以前的学术上尤其不妥当。有学者主张,科学和技术应该区别开来,这样讲的话科学更应算在学术以内。我们讲的学术史,用现代分科来说,包括文科、理科等的历史。²

李先生之言并非新论。如前所说,“学术”一词包含文科和理科在清代已有此见,只不过我们这么多年囿于传统而无人注意罢了。李先生是学界泰斗,此说经先生重提也就具有了权威的意义,况且他麾下的一班人马已陆续按此设想写出了一部学术史。

笔者以为,自然科学列入不列入学术史都无关紧要,因为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发展到何种程度,只一部科技史就可以说明,根本不需要学者对之进行复杂的诠释。倒是历史上的人文科学始终与人

1 董乃斌:《关于学术史的纵横考察》,《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

2 李学勤主编,王志平著:《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第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

类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思想的复杂性远非如自然科学那样只需较少的笔墨便可说明,需要学者永无止境的探索,因此,学术史研究的重心永远都是借助对古代学术活动本身的研究探明古人从事某方面研究的动机和通过研究而申明的思想。正如李学勤先生已经意识到的那样:

真正的学术大家,没有不具有深刻而系统的思想的。历史上的学者,有些于当世文化知识无不通习,如中国的朱子、英国的培根,固不用说;现今的学者,也多在专门的学科之上有其高瞻远瞩的思想观点,连自然科学家都不例外,有谁能说爱因斯坦、斯蒂芬·霍金等不能称为思想家呢?(同前)

可见,学术史虽不是思想史,但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如此紧密,因而正如李先生的看法所昭示的那样,研究学术史的最终目的不应当是唯学术而学术,而应该揭示出古代学术与思想发明的关系,通过研究学术史去发现古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关心的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新的发现。

遗憾的是李先生主编的这部学术史从体例上看,也仍然是一部旧式的学术史,并未达到李先生序言中所提的学术应探明思想的目标。

与李先生主编的多卷学术史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北大版“学术史丛书”的总序则是这么说的: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

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但总序同时也承认:

无论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结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术而学术”,既不现实,也不可取。(陈平原,北大版“学术史丛书”总序)¹

应该说,以上两部自成系列的学术史著作确实贯串了当代学者对学术的新理解。但在笔者看来,他们的学术史依然属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式的,在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牵连”上做得不夠。

李书与北大版丛书虽然都认识到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但他们对学术的理解却始终都离不开“源流”二字,即他们仅注意研究历史上的一些显见的较专门化的学术。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尊重古代人们的理解,则“学术”不仅仅包括已成所谓“某某学”的系统的学问,还应该包括散见于各历史时期的“无名小卒”的思想,哪怕是一孔之见,都是“学术”的火花。更具体地说,一种学术对当时社会及后世政治产生的影响如何,不完全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某一流派或是否产生了系统研究论著,有时候,活跃于帝王身边的士人的一篇奏章,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要比一布衣士人的“纯学术”产品大得多。如果我们只注意“辨章”、“考镜”式的研究,而对如奏章、片言碎语等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则等于放弃了学术史研究中最最重要的内容,更谈不上使我们的学术史研究与思想史和文化史有多大牵连。简言之,传统的学术史思路仅注意到学术史

1 何成轩《儒学南传史》,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上的一些“显见”的内容,而更多的能反映当时学术水平的只言片语却大量地从学术的视野中流失了。

笔者认为,在学术史研究中真正加大历史背景、思想和文化的比重,不失为一条学术史研究的创新之路。近年来,学术界其实有人已作了尝试,试图摆脱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在学术史研究中加大思想与文化的分量,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就是一个新路子。他的洋洋两大卷思想史其实就是打着思想史旗号的“另类”学术史。此思想史的写作既不同于传统的思想史的写法,又有别于学术史的撰写传统,作者所走的实际上是学术史与思想史交叉的偏锋,故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事实上,历史上能成一家一派的学术只是狭义的学术,是精英学术,是书院式的学术,实际上只占了全部学术的一小部分,而遍布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术不仅仅是在精舍中产生的学术,还有散见于朝臣奏章、民间方术、民谣民歌中的学术火花。所以研究学术史不能仅仅盯住少数经院式人物的学术活动,而应从广泛的意义上研究中国学术。书院式学术有时对历史的走向和统治者的决策并不起多大作用,因为书院式学术御用性太强,故难于有新的发明;而民间学术却常常不囿于陈见,恰恰能起到历史的推动作用。

一定时期的学术总是既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制约,又服务于当时的社会环境需要;而一定时期产生的思想背后总有一个坚实的学术探讨的背景,思想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之上。学术史不仅应该研究历代有明确学术源流、师承和有显著成果的学术,还应该注意一些隐性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舍。有时候如果我们只注意到一些系统的学术著作,就不能客观地反映同时期的思想。如王充的《论衡》写出后,在当时并未起到很大的影响,甚至不为人所知。再如,陶渊明的思想,我们今天对之评价很高,但在其生活的时代,却并未得到重视。总之,理解时代的思想,必须既注意显现的已成篇的学术著作,更要注意挖掘隐含在系统学术论著背后的没有写

出系统作品的士人的学术和思想。历代受统治者提倡的,士人借之安身立命的主流学术都是显性的,易为人知的。但在历史的某些时期,有些学术活动虽无明确源流、师承,也无明显的学术成果可供研究,但从历史活动中人们的言行可知其时对哪一方面的学问比较重视,观那时人们的言行便可知人们对学术委实已作过取舍。如曹操,大家都知道,他是用法家思想作为理论指导的,但具体说他对《韩非子》进行过什么研究,则谁也不知道他在这方面有什么作品传世,但谁也不能否认他对法家学说的权术的确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而深谙法家治国之道,因此曹操重法家思想亦可看成是学术史上重要的一环。其次,学案式的学术史研究不是学术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学术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探明人们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究竟通过学术活动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发现。人们常用“沉闷”、“繁荣”等语词来形容学术史上的不同时期,述说的也就是学术史不同时期的学术价值。先秦之所以被后世视若中国文化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就是因为其时产生了很多的学术发现、学术创新。《庄子》要求人们“得渔忘筌”、“得意忘象”,同样适用于学术史研究。学术的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的学术活动所留下的思想和学术精神。学术史虽不同于思想史,但学术史与思想史在较高层次上势必达成统一。

基于上述考虑,并受葛兆光先生的启发,本书的写作既不同于以往意义上的学案式学术史研究,又不同于传统的思想史写法,而是在文中加大对历史时期的学术氛围形成的背景分析,从中可见思想的变动对学术走向产生了影响,反之变化后的学术又影响了思想。因此本书虽也涉及建安学术具体的学术研究成果,但研究